

DOI: 10.16482/j.sdwy37-1026.2022-04-013

# 雅各布森六功能之翻译符号学剖析

王新朋<sup>1</sup> 王铭玉<sup>2</sup>

(1. 常熟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熟 215500;

2.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摘要] 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符号为广义符号, 包含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具有反复播放性的多模态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以及大脑思维符号。雅各布森针对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语言符号提出了六功能理论, 而翻译即交际, 依据功能对等原则, 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符指活动和符号交换也同样具有多功能性, 符合六功能模式。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六功能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符号内涵, 在深入剖析六功能符号内涵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六功能的主导与交互关系, 为翻译符号学的符号功能界定做出了理论上的尝试。

[关键词] 翻译符号学; 雅各布森六功能; 符号内涵; 主导与交互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22)04-0125-09

## A Translation-Semiotic Perspective of Jakobson's Six-Function Model

WANG Xinpeng WANG Mingyu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2.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S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are generalized ones, including linguistic signs, non-linguistic signs, a synthetic text composed of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signs, a synthetic repetitive multi-modal and multi-medium text, and intangible signs. Jacobson proposed the six-function theory of language signs for the process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 in which multi-functional semiosis and sign transformation also conform to the six-function model. Such a view brings to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in this paper.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six functions demonstrate different semiotic

收稿日期: 2022-02-09; 修改稿: 2022-05-29; 本刊修订: 2022-06-05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成就研究”(项目编号: 22AZD006) 和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中央文献核心语汇多语种词典编纂和数据库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新朋, 博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符号学、雅各布森研究。电子邮箱: wangxp@cslg.edu.cn。

王铭玉,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言学、符号学、“一带一路”。电子邮箱: mywang2@163.com。

引用信息: 王新朋, 王铭玉. 雅各布森六功能之翻译符号学剖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22(4): 125-133.

connotations.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connotations, the dominanc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six functions are further explored to make a theoretical definition of the semiotic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semiotics; Jakobson's six-function model; semiotic connotation; dominance and interaction

## 1. 引言

王铭玉(2016: 1)指出翻译符号学是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包含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符号守恒、符号阐释等八个层面。基于翻译符号学视角,对洛特曼符号域(Lotman, 1984)进行重新界定后,贾洪伟(2018)以物质介质为参考点,把人类表意符号划分为依存于外部物质介质的有形符号和依存于大脑内部介质的无形符号。将雅各布森于1959年提出的语内、语际、符际翻译进一步拓展为域内、域际、超域翻译。而雅各布森在1958年针对言语交际过程,提出语言符号的六功能(Jakobson, 1987),对于认识符号功能也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针对域内、域际和超域翻译中的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探讨雅各布森六功能的符号内涵和主导交互关系,意在阐明:雅各布森六功能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模式,更是一个符号学模式;不是语言符号所独有,也同样适用于非语言符号、多模态多介质符号,乃至大脑思维等无形符号。最后,尝试为翻译符号学的符号功能界定做出有益的探索。

## 2. 翻译符号学

王铭玉(2015: 1)在2015年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上以大会主题发言“翻译符号学之构想”率先发轫,界定翻译符号学为“符号学门类下的一个分支领域,专门用来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现象及相关问题”,着手构建学科框架,打造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地位。随后,不少学者先后加入对翻译符号学理论和研究边界的探讨(贾洪伟, 2016, 2018, 2020; 吕红周、单红, 2016; 潘琳琳, 2018; 佟颖、王铭玉, 2018)。国外的格雷(Gorlée, 1994)和特洛普(Torop, 2008)也曾进行符号学与翻译学融合研究的探索,但并未将其提升到构建学科框架的高度,留下诸多尚待探究的领域。

“在翻译符号学视野下,翻译已超出了语言的边界,不再只是一个自然语言文本转换为另一个文本,而是涉及自然语言、话语、视觉、听觉等媒介的多层级的系统性转换”(吕红周、单红, 2016: 38)。不同于传统翻译概念中的语言符号,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是广义上的符号,只要能够传情达意,或只要为思维活动主体——人所知所感,就进入了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符号既包含以物质介质为载体的有形符号,也包含人类大脑神经系统用以思维、思辨、构思、思考等的无形符号(贾洪伟, 2018: 117)。前者包含依赖外部空间介质的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后者指依存于大脑神经系统作

为内部空间介质的思维符号。

为区别于雅各布森在 1959 年提出的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 Jakobson, 1987), 贾洪伟以洛特曼的符号域为基础, 提出域内、域际和超域的三域概念, 指出“同一民族文化同一历史时期或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次空间之间, 不论是互动还是转换, 都没有超出民族文化的空间范畴, 故而属于域内翻译。不同民族文化同一历史时期或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空间之间的互动与转换, 跨越了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空间界限, 故而属于域际转换。从一个民族文化空间的某一介质形式走入同一种民族文化不同介质( 尤其是新技术介质) 构成的多重介质合成的复合型空间, 抑或是走入不同民族文化不同介质构成的多重介质合成的复合型空间属于超域翻译”( 贾洪伟, 2020: 102)。

在符号转换类型方面, 无论是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 还是同一民族文化范畴与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之间, 均存在三类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 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域内翻译、域际翻译与超域翻译均如此。然而, 超域翻译强调符号活动与符指过程超越传统纸媒为主的载意空间, 进入声响、灯光、言语行为、肢体动作等多元素构成的反复播放性多介质合成文本符号, 即屏幕承载的影像符号文本( 贾洪伟, 2020: 107), 这一划分拓展了人类交际过程和文本阐释的研究视角, 也为科技大发展背景下的新介质多模态载意空间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在符号功能方面, 翻译符号学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 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 主张无论是有形符号还是无形符号, 在符号转换过程中均发挥多种功能, 如表达、描述、呼吁、社会、情感、意动、指称、元语言、交际、诗学等, “了解各类符号功能对应的文本类型特征, 有助于译者从宏观上把握信息文本的类型、组织布局模式、信息焦点、信息传递指向和文本主旨, 从而在阐释和解码基础上用另一门语言符号以最大的相似度呈现同一类型的信息文本”( 王铭玉, 2016: 9)。

### 3. 六因素六功能的提出

作为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雅各布森从交际的视角考察语言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在雅各布森看来, 语言不是一个静止的系统, 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动态的功能系统。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 必然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实现一定的功能。雅各布森在比勒( Buhler, 1990)、穆卡洛夫斯基( Mukarovsky, 1977) 等布拉格学派成员和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23) 对语言功能分类的基础上, 结合香农( Shannon, 1948) 信息通讯理论中的部分要素, 从语言交际的社会要素出发, 提出了语言行为六要素之说及相对应的六功能。

在雅各布森( 1987: 66) 看来, 言语交际行为的社会要素不仅仅局限于言者、听者、信息和外部世界, 而应拓展为六种: 说话人( addresser)、受话人( addressee)、语境( context)、信息( message)、接触( contact)、代码( code), 分别对应六种功能: 情感功能( emotive

function)、意动功能( conative function)、指称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诗性功能( poetic function)<sup>①</sup>、交际功能( phatic function)、元语言功能( metalingual function)。其中,接触、代码以及元语言功能为雅各布森首次提出,使这一功能体系更加系统完备。

任何一个言语交际行为,都蕴含着以上六大要素,每一要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依据彼此之间层级关系、主导成分的不同,构建不同的话语类型,实现不同的交际功能。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很少仅有执行一种功能的言语活动,因为语言具有多功能性,各项功能组成一定的等级序列,其中一项功能占据支配地位,成为主导性功能,决定着整个言语活动的外显趋势和类型( Jakobson, 1987: 66)。从符号学视角来看,交际活动中某一因素或功能成为主导时,整个话语呈现出特定的属性或意义向度:情感性、意动性、指称性、诗性、接触性、元语言性;其中,情感性和意动性、指称性和诗性、接触性和元语言性两两对立,此消彼长(赵毅衡, 2017: 326)。

总之,雅各布森提出的六因素六功能模式“已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模式,而更是一个符号学模式,为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所共有,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理论诠释力和现实意义”(王新朋, 2020: 103)。在翻译符号学视角下,随着翻译符号的内涵不断延展,出现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的划分,以及多介质多模态符号文本的持续涌现,六因素六功能模式本身也拥有了更广阔的的诠释空间。

奈达说,翻译即交际,并针对翻译过程提出功能对等理论,强调翻译过程中不追求目标语和源语言在文字表面上的一一对应,而应使用恰当、自然的语言实现两种语言间的功能对等( Nida, 1993: 116)。例如,移民家庭中的孩子幼年时能够自然流利地为祖父母翻译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然而,长大入学之后,学习了词汇、语法等,过多关注于词汇句法等的一一对应,翻译却不再那么自然流畅了。对于功能对等,奈达指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对等,不能从数学意义上来理解“对等”,而是指翻译过程中功能上的大体接近,最终使译语接受者能够获得与源语接受者大致相当的感受和理解( Nida, 1993: 117)。

雅各布森六功能模式能够对言语交际过程进行系统完备的阐释,对于翻译符号学中符号交换的功能对等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 4. 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六因素六功能

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对象内涵得到极大扩展,包括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具有反复播放性的多模态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以及大脑思维符号。雅各布森针对言语交际过程提出的六功能模式对于翻译符号学中的符号功能也有很好的理论阐释价值。

##### 4.1 六功能的符号内涵

雅各布森( 1987: 66)认为,当言语交流行为趋向于说话人或符号发出者时,情感功能成为主导,用于表现说话人的情感或态度。情感功能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是各式各样的

感叹词,如“哎呀”“啊哈”“噢”“啧啧”等。翻译符号学视角下,情感功能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符号,也有非语言符号的介入,与人交流时的语气、姿势、表情、肢体动作等伴随文本,也能充分表现一个人的情绪或情感,甚至有时其传递的文本意义已大于语言符号本身。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各种社交聊天软件中,我们经常不使用语言符号,而是运用形态迥异的各色表情符来展示个人的情绪或情感,或者是语言符号与表情符的双重加持。逢年过节表达祝福以及日常交流进行问候时,各种信息文本中异军突起的往往是运用多模态多介质、具有反复播放性的合成符号文本,使主体的情感倾诉达到极致。至于大脑思维符号的情感功能,我们不会忘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表达,内心胸怀澎湃,外表平静如水,各种情感交错。情感功能是人类的初始功能,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和动物共享的功能之一,但理性的人类需要学会如何掌握和管理情感,而非忽视语境,恣意挥洒。

当交流倾向于听话人时,意动功能成为主导,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呼唤语、祈使句甚或命令,意在敦促听话人采取一定的行动(Jakobson, 1987: 67)。意动功能是各类广告、宣传、警示、预言文本的内在属性,不存在真值检验,其时间向度指向未来,以将要发生之事诱使听话人改变态度、转变情感亦或采取行动。意动功能不仅仅表现在言语上的“以言行事”,也体现在文化和体裁上。随着经济交流的频繁深入,意动性已成为人类的基本交流方式,整个文化进入了“普遍意动性”的时代(赵毅衡, 2017: 330)。语言符号能够“以言行事”,具有意动功能,非语言符号也如此,最常见的是音乐,忧伤的音乐使我们黯然伤神,欢快的曲子令我们不由自主抖动身体。很多人喜欢到现场听音乐会,因为在现代技术的介入下,各种声响、灯光、歌词、肢体动作,构成反复播放性多模态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使意动功能发挥至极致,得到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体验。与此相类似的还有3D影院的观影体验,足球比赛的现场观赏等。谈话中的“雄辩的沉默”(eloquent silence)(Ephratt, 2008: 1920)也能发挥意动功能,面对社交场合中的禁忌言语、污言秽语,刻意为之的突然沉默,往往意在促使言者改变谈话方向,这也是大脑思维符号意动功能的一种体现。

当交流趋向于语境时,指称功能成为主导(Jakobson, 1987: 62-94)。指称功能是传播交际活动中的主要功能,以明确信息传达的意义,既可以使用语言符号,也可以运用非语言符号,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多模态多介质符号文本也不断涌现: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符号和科技符号,如交通指示灯或元素周期表,传递信息十分明确,凸显“所指优先”;艺术符号往往缺乏明确所指,犹如天空模糊的星云,不明确指向语境或对象,而专注于符号自身,凸显“能指优先”。语境或对象,即意义之所在,即便信息本身不是那么明确,凭借符号发出者和接受者共享的语境也能明了其所指。譬如,中午和同事一起在餐厅用餐时,同事侧身对你说,“我的卡忘带了,能用下你的卡吗”,这里的卡虽未明示,但显然指的是餐卡,而非银行卡或信用卡之类。人类最初使用语言符号时,词与物的关系明晰且透明,但随着符号内涵的扩大,词与物的关系渐行渐远(福柯, 1966)。然而,符号文本之间无处不在的互文性、对话性以及触手可及的伴随文本,为文本意义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任何文本都无法脱离民族文化等语境因素,却依然拥有饱满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基于

民族文化的域内、域际翻译的切分。“我们的思想意识本来就是一部合起的伴随文本词典,等着解读时来翻开,来激发。……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在读到一个文本之前,已经理解这个文本;也只有理解了文本,才能被我们理解”(赵毅衡,2017:154)。面对外界之物时大脑思维符号的“浮想联翩”网络技术中的超链接,恰恰也是互文性的具现。

在雅各布森看来,当交流趋向信息本身时,诗性功能占据主导,凸显符号自身的可感知性,加深了符号和客体(即对象)的分离(Jakobson,1987:62-94)。诗性功能专注于语言的形式,而非内容。诗性功能是雅各布森在文论方面的最大贡献,消弭了诗歌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的本质区别。日常生活语言也具有诗性功能,但非主导地位,是语言符号自身多功能序列中的一种。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店名、广告或顺口溜,在发挥指称、意动功能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诗性功能。譬如,“面对面拉面”“王子饺子王”“美的电器,美的享受”以及“Don't Dream It, Drive It”,本身只是拉面馆、饺子店、美的电器和捷豹汽车的广告,读来却朗朗上口,韵味十足。不仅语言符号能够表现诗性功能,非语言符号也是如此:落日余晖、五彩烟花、茵茵草坪上朵朵玫瑰摆成的心形图案……符号本身即显现一种诗性的美。运用现代技术和电子介质,更能呈现一种异样的诗性之美,譬如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运用多模态多介质所创造的盛大烟火表演。然而,诗性功能也是翻译符号活动中最难处理的方面,因凸显语言形式,而非交际内容,形式的微调或变动都会使原来的诗性荡然无存。如果说日常生活符号的理解往往是自动化的,那么诗性符号则通过加工、扭曲、变形等陌生化处理,使符号接受者倍感新意,阻止思维的自动化处理,延缓审美感受。

当交流趋向接触时,交际功能成为主导(Jakobson,1987:62-94),有时也称为寒暄功能。此时的交际活动既非指称事物,也非传递信息,更非敦促对方行动,而是自由、零散、散漫的话语风格,谈论无关紧要之物,描述显而易见之事,这种轻松随意的交谈让言者和听者都从中获得极大的社交满足感和愉悦感,交谈内容本身无太大意义,但却彰显了彼此交际渠道的畅通。这里的畅通既指物理通道的畅通,也包括彼此的心理联系,即对交流本身的关注、兴趣和共识(attention, interest and agreement),使寒暄得以顺利进行下去(Kulkarni,2014:119)。父母的叮咛、爱人的唠叨、恋人的絮语、同事的问候,以及婴儿的咿咿呀呀,我们享受的是此时此刻交流渠道的畅通,信息内容倒在其次。不仅语言符号能够如此,非语言符号也能发挥寒暄功能:熟人见面时的握手、离别时的挥手,有时甚至无声胜有声,譬如妈妈和婴儿的深情对视、恋人间的眉目传情。随着因特网和即时通讯社交软件的发展,寒暄或交际功能已扩展到由网络表情符号、图像、语音、视频等多模态多介质构成的全景式信息,称之为“寒暄技术”,也不为过。“寒暄技术是通讯技术的一种,其交流的本质在于维系关系而非交流信息”(Wang et al.,2011:45)。在基于寒暄技术的交际活动中,信息发送失误时可即时撤回,发出或接受的信息也能反复查看、回放,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性管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达到极致,具有反复播放的重复价值。

现代逻辑学中很早就区分了“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和“元语言”(metalinguage),前者谈论客观世界,后者谈论语言自身(Jakobson,1987:69)。元语言并

非逻辑学家或语言学家所独有,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运用而不自知,譬如日常交流中询问对方“你在说什么”、谈话进行中向受众核实“明白我的意思吗”以及对某一具体词语内涵的确定,都是为了确保彼此之间符码的大体一致。此时交流的侧重点不在信息本身,而是符码的内涵和使用,发挥元语言功能。语言可以用来谈论外部世界,也可以描述语言自身,两者属于语言的不同层次,前者发挥语言的指称功能,后者为元语言功能。譬如,“太平洋的中间是什么?(平)”或者“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re and there?(The letter t)”,可见元语言显然比对象语言高出一个层次。“语言的理解靠阐释,而阐释又使语言得以实现,这就是元语言功能的真谛”(王铭玉,2001:52),同理,任何符号文本不能独立存在,只有获得阐释的文本才能存在,而阐释的背后是元语言集合。可以说,元语言是符指过程中的大脑中枢和指挥系统,脱离了元语言,任何意指无法实现;元语言集合往往变动不居,而基于代码的阐释也是变动的。笔者当前对翻译符号学符号功能的界定与阐释本身也是元语言功能的体现。在现代技术发展背景下,借助非语言符号和多模态多介质电子文本,元语言的阐释功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运用与展现,比如结合棋盘棋子对国际象棋规则的演示,使用多媒体多介质电子文本对产品工作原理和性能指标的阐释,运用虚拟技术对外太空银河系运转系统的模拟展示,等等。

#### 4.2 六功能的主导与交互

翻译符号学的符指过程中存在六要素及相对应的六功能,而在符号功能上,主导功能始终存在,六功能之间也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关系。

主导(the dominant)是俄国形式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在雅各布森看来,“主导成分是一件艺术品的核心成分,它支配、决定并转变其余的成分,以确保整体结构的完整”(Jakobson,1987:41)。譬如,日常生活语言也具备一定的诗性功能,如商店店名、广告等,但商店店名的主导功能是指称性,而广告的主导功能显然是意动性。在翻译符号学的符号交换过程中,主导功能始终存在并持续变动,新的主导代替旧的主导成为常态。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元曲”也显示了主导功能的时代更迭和形式演变。在翻译活动的符指过程中,因主导成分不同而展示不同的主导功能,需要在符号转换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呈现形式。例如,我们熟悉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便可呈现不同主导功能:若是倾向于语境,指称功能为主导功能,意在说明苏杭之美这一客观情况;若是倾向于符号发出者,则凸显符号发出者的情感功能,苏杭之美令人沉醉;若是趋向于符号接受者,则具有强烈的意动功能,希望促使听者到此一游;若是趋向于接触,交际功能成为主导,也许是火车上、游艇上,两位游客为打破尴尬、沉默的破冰话题;若是趋向信息本身,诗性功能成为主导,凸显语言形式本身的对仗和韵律;对于尚未识字的婴幼儿而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等待阐释的陌生符码,不知所指何物的音响形象。符指过程呈现多功能性,除了主导功能外,其余功能也蕴含一定的等级序列,随主导属性的变化而变化,而非处于平等位置。譬如,爱情诗和说教诗,均以诗性功能为主导,但前者也强调其中的情感功能,后者为意动功能。把主导概念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时代的变迁也反映在文化上主

导功能的更迭。比如,在神学时代,僧侣在宗教阐释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元语言功能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社会随着权威的消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社会趋势使诗性功能成为主导,一切符号活动都围绕艺术,伴随着非视觉符号文本的“图像转向”;多模态多介质的电子社交媒介也使寒暄功能一跃成为当下社会的主导;经济社会的买方市场又使刺激购买力的广告无处不在,意动功能在多模态多介质的广告文本中成为主导功能。

雅各布森提出了言语交际过程中的六功能,但对六功能之间的交互关系着墨不多,仅对元语言功能和诗性功能在形式上的对等相似略作比较(Jakobson, 1987: 71)。赵毅衡(2017: 326)在对六功能关系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认为六因素可以构成三组两两对立的关系,某一因素上升为主导,不可避免地要以与其对立的另一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为代价。笔者以为,符指过程中六功能的交互关系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三组两两对立,而是更加复杂,“既有情感性与意动性、指称性与诗性以及接触性与元语言性的两两对立,也有代码、信息和语境围绕文本意义而展开的意指活动,更有接触、发送者和接受者以关系为主导而建立的交流渠道”(王新朋 2020: 103)。譬如,人际交往中,过度的情感宣泄,反而阻碍了交际意图的实现,降低了意动性,而适度的情感流露和情绪管理,能够在交际中处于有利的位置,更有利于交际目标的达成。再如,为了使符号接受者采取必要行动,我们往往“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这一符指过程虽以意动性为主导,但离不开情感性、指称性以及接触性的协调配合。若以文化的时代变迁为例,也能发现六功能之间的此起彼伏,交互更迭:从理性时代的指称性凸显,到当代社会的诗性增加,全民娱乐化成为趋势;从浪漫主义时代的情感性跃升,情感功能得以充分表现,到当代社会商品供大于求,意动性成为社会经贸活动的基本属性;从神权时代凭借元语言性来确立权威,到当代多元文化兴起,权威消解,电子媒介迭出,重在沟通、强调人脉的接触性得以凸显。

## 5. 结语

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符号对象扩展至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大脑思维符号以及现代技术背景下的反复播放性多模态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交际过程,雅各布森针对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语言符号提出的六功能理论,已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模式,更是一个符号学模式,依照功能对等原则,同样适用于域内、域际、超域翻译的符号交换活动。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符指活动和符号交换过程同样具有多功能性,符合六功能模式,并且能够凸显主导功能,揭示六功能之间较为复杂的交互关系。

注释:

- ① 这里采用田星(2007)的译法“诗性功能”,其他表达方式还有诗学功能、诗歌功能等。

参考文献

- [1] Buhler, K. *Theory of Language: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M]. D. F. Goodwin (trans.). 132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0.
- [2] Ephratt, M. The functions of silen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11): 1909–1938.
- [3] Gorlé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M]. Amsterdam: Rodopi, 1994.
- [4] Jakobson, R. *Language in Literature* [M].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1987.
- [5] Kulkarni, D. Exploring Jakobson's "phatic function" in instant messaging interactions [J].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2014, 8(2): 117–136.
- [6] Lotman, J. On the semiosphere [J]. *Sign Systems Studies*, 1984, (17): 5–23.
- [7]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s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 [A]. In C. K. Ogden & I. A.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23. 296–336.
- [8] Mukarovsky, J. Poetic reference [A]. In L. Matejka & I. R. Titunik (eds.). *Semiotics of Art: 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 [C]. London: The MIT Press, 1977. 155–163.
- [9]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10] Shannon, C. E.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J].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1948, 27(3): 379–423.
- [11] Torop, P. 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8, 36(2): 253–257.
- [12] Wang, V., J. V. Tucker & T. E. Rihll. On phatic technologies for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human relationships [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1, 33(1–2): 44–51.
- [13] 福柯. 词与物 [M]. 莫伟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66.
- [14] 吕红周, 单红. 彼得·特洛普的翻译符号学观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5): 33–39.
- [15] 贾洪伟.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 (3): 90–100.
- [16] 贾洪伟. 论翻译符号学的符号分类与转换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1): 111–118.
- [17]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三域问题剖析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1): 98–109.
- [18] 潘琳琳. 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 [J]. *外国语文*, 2018, (3): 119–127.
- [19] 田星. 论雅各布森的语言艺术功能观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 (6): 14–16.
- [20] 佟颖,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符号守恒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1): 100–110.
- [21] 王铭玉. 俄语学者对功能语言学的贡献 [J]. *外语学刊*, 2001, (3): 42–53.
- [22]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刍议 [J]. *中国外语*, 2015, (3): 1+22–23.
- [23]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5): 1–10+18.
- [24] 王新朋. 雅各布森六因素新论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0.
- [25] 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责任编辑: 杨彬)